

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与公平感研究*

李 升

摘要: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对其公平感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年轻的新生代受雇农民工不易形成社会公平感;劳动获得相对较低不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劳动保障完善有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不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由此可以推断,改善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或许会成为提升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受雇农民工 劳动关系 公平感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涉及农民工的劳资冲突及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引发社会紧张感的重要社会问题。尽管在中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被认为是处于城乡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双重边缘化”的“弱势”位置,但“弱势”的呐喊与行动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底层力量”(赖伟军等,2011)。对此,近年来学界关于农民工维权、抗争、冲突等问题的研究日趋增多,集中于探寻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蔡禾等,2009;汪建华等,2013;张翼等,2014)。相关研究揭示的农民工发生社会行动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工作的更高期望及遭遇的不公平经历等。而从经历到社会行动的“中间环节”则是社会意识的形成,于是也有研究重点将视角放在农民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态度等社会意识领域(朱考金,2003;李培林等,2007、2010、2011;陈海英,2011;李慧中等,2012)。

本文将面向农民工的社会心态领域进行探讨。公平感作为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一般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受到公平感的影响,当人们感到公平时就会表现出积极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行为(van Prooijen et al., 2006),而一旦产生不公平感,就会动摇社会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导致社会冲突(Coser, 1956)。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当前农民工公平感普遍偏低,受到个人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王俊秀等,2013)。对于进城工作的农民工而言,公平感的缺失不仅容易形成矛盾冲突,也会导致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低等诸多社会问题(王甫勤,2013)。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于农民工来说,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关系状况是其主要的社会存在。如果劳动关系状况出现“不公平”问题,那么必将会对农民工的社会心态产生影响,“不平则鸣”往往成为劳资冲突的集中表现(游正林,2005)。那么,当前农民工的公平感究竟如何?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劳动关系状况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公平感?本文将根据北京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给予实证分析。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一)关于农民工公平感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文献颇多,表现出学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持续“高热”的关注,但多数研究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构建研究”(14CSH012)和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近郊区城中村改造与外来人口管理研究”(13JDSHC011)的阶段性成果。

集中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流动机制、城市融入以及社会后果等领域,而关注其公平感等社会心态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李培林、李炜通过对2006年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反而具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其中,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李培林等,2007)。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公平感之间的“反差”?亚当斯最早开展了关于公平感的经验研究。他提出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公平感是用自己的“获得/付出”比率与他人的“获得/付出”比率相比较的产物,一旦比率相同,就会形成公平感,相反将产生不公平感(Adams,1965)。基于此逻辑,李培林等学者的回答是,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是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非经济决定逻辑(李培林等,2007)。后有学者也指出,农民工在经济地位较低时之所以会有积极的社会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期望值较低(陈海英,2011)。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的认知定位较低,当他们进城工作的获得高于他们原本的期望时,他们就较容易满足,从而公平感等社会评价较为积极。

然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李培林、李炜两位学者后通过对2006年与2008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比较分析得出,农民工群体在两年的时间里社会态度便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虽然农民工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上有了显著提高,但在就业和生活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其社会公平感和满意度等却有所降低(李培林、李炜,2010)。对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李培林、田丰具体分析了就业收入水平、生活压力和个人权利意识对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的影响(李培林、田丰,2011)。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就业机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和待遇方面,表现出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的不公平感。也就是说,农民工由工作产生的生活压力和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不难理解,当前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已不像早些年由于期望较低而显得积极,他们会随着对自身认知定位的提升(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平感等社会心态上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和他们在城市中的劳动就业状况方面紧密关联。

(二) 劳动关系状况影响农民工公平感的研究假设

公平感是对公正认知的一种社会心态,影响公平感的因素既包括个体的主观心理感受,也包括客观的社会结构因素。其中,工作和奋斗的目的是个人的价值选择,是影响公平感的核心(赵琼,2005)。尽管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等诸多变量(李春玲,2006),但从亚当斯对公平感的论述不难看出,个人对于“获得/付出”的认知,是需要放在工作的劳动关系之中来分析的。换句话讲,即工作的劳动关系状况对人们形成公平感起到重要作用。劳动关系是劳动力使用者与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郭庆松,2002),而劳动付出、劳动报酬以及劳动保障等反映了劳动者一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权益关系。因此,劳动关系状况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影响到劳动者的社会心态。劳动关系的规范化,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能维护社会稳定(Clarke & Lee,2002)。

在劳动关系状况与农民工公平感方面,有研究指出,劳动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农民工的公平感没有影响,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视为影响其社会公平感的主要变量(胡荣、陈斯诗,2010),但这或许仅是一个中介变量。正如有研究指出,在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最主要的劳动就业适应方面,正是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及劳动保障等劳动关系状况方面的待遇不公平,影响了其社会融入(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李珂,2006)。因此,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权益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重要原因(郑功成,2009)。更有研究通过具体的个案考察,指出农民工的工作现状就是劳动报酬低微、劳动合同缺失以及劳动强度较大等,这些劳动权益的难以保障,使他们成为市场位置中的“边缘化”群体,不利于他们积极的社会心态形成,容易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王长仁等,2011)。不难看出,一些相关研究已指出农民工劳动关系状况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但将农民工的劳动关系状况与公平感联结起来的实证分析仍有欠缺,而本文将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重点探讨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对其公平感的影响。从对劳动关

系状况衡量的一般研究不难得知,劳动获得、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强度等劳动权益因素构成衡量和评价劳动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对于劳动者一方。因此,本文也将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权益因素对受雇农民工公平感的影响作用,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首先,从亚当斯关于公平感来源于雇佣关系中的“获得/付出”比较的论述可以得出,人们的劳动获得越多,越可能在比较中获得较强的公平感,这一点在经验实践中容易理解。对农民工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城市工作,主要是期望能够在城市中有比在农村更多的劳动获得,一旦获得较多的劳动回报,便会认可城市的规则与秩序,作为城乡劳动比较利益发现者的农民工也会肯定自身的价值(郑英隆、黄振荣,2013),由此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是:受雇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获得越多,越容易产生较强的公平感。

其次,劳动保障作为形成“获得/付出”结果的条件,也成为影响公平感的重要因素。劳动保障的核心是劳动合同,这为劳动者能够通过“付出”而“获得”提供了根本保证。另外,即便签订了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遭遇到了未预期的利益受损等经历,也将产生不公平感,即劳动者在衡量“报酬/投入”时,遭遇的挫折经历越多,不公平感就越强(罗忠勇、尉建文,2009)。对于城市中受雇的农民工来说,是否有稳定的对劳动获得的劳动保障,将会影响他们的公平感等社会心态。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设是:受雇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保障实现,能够增强其公平感。

最后,劳动强度作为最直接体现劳动“付出”的程度表现,也成为讨论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重要指标。劳动时间、劳动性质、劳动紧张程度等构成了劳动强度的主要内容,其中,劳动时间通常被视为衡量劳动强度的核心指标。一般而言,高强度的劳动会使劳动者增强对劳动获得的预期,也会加大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意识,一旦劳动获得与预期有差距或比较后感觉到差别,劳动者就会认为付出的劳动没有相应获得,便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设是:受雇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强度越大,越不易产生公平感。

三、数据与变量分析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由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3年6月对北京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做的专题调研数据。该调查以市场管理办公室或村流动人口管理站提供的流动人口名单进行随机抽样,样本量为2416人。其中受雇的农民工有957人,其余人为自雇佣者及雇佣他人者,调查的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城市中低端的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等工作。由于本文从劳动关系状况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重点分析受雇的957人。

本文的分析变量是公平感,并根据社会心态的“个体-社会”的结构和测量方法(王俊秀,2014),将公平感分为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类型,即分为两个因变量。个体层面的公平感(因变量Ⅰ)是个体根据自身情况对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出的意识判断,具体针对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按照您的能力和付出,您觉得现在的经济地位公平吗?”进行分析。社会层面的公平感(因变量Ⅱ)是个体对整体社会公正认知的意识判断,具体针对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总体而言,您觉得现在的社会公平吗?”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的分析模型为logistic回归分析,因此将因变量均作二分的虚拟变量处理。具体操作化为:对于因变量Ⅰ,认为现在经济地位“非常公平和比较公平”编码为1,否则为0;对于因变量Ⅱ,认为现在社会“非常公平和比较公平”编码为1,否则为0。作为影响因素分析的自变量包括:(1)个体因素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2)作为劳动获得因素的“物质获得”部分,即工资月收入、雇主提供住所、加班报酬获得,劳动获得因素的“精神获得”部分,即在工作中和在北京的受尊重程度;(3)作为劳动保障因素的劳动合同签订、拖欠工资经历;(4)作为劳动强度因素的每日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1. 因变量的分析结果

对于农民工公平感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有效回答的954个结果中,在个体层面,对自己现在的经济地位有公平感的比例仅有17.8%,绝大多数人则无公平感;在社会层面,对现在社会持有公平感的比例为25.9%,而多数人也无公平感。不难看出,在北京打工的多数受雇农民工公平感较弱,这与一些已有研究及相关报道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从统计结果中也能够看到受雇农民工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公平感差异,即对社会的公平感知要高于对个人的公平感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们对个人的主体权益更为看重,因此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认知感受要强于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感受。

表1 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操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类别	个体层面公平感		社会层面公平感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有	170	17.8	246	25.8
无	784	82.2	708	74.2
总计	954	100	954	100

2. 自变量的分析结果

对于影响因素的自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1)受雇农民工的年轻化 and 低学历化。在基本属性因素方面,调查对象中的男性受雇农民工数稍高于女性;年龄层方面,“80后”、“90后”的年轻代农民工较多,比例占到约2/3;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近半数受雇农民工在“初中及以下”水平,仅有11.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

(2)受雇农民工的劳动获得相对较低。在劳动获得因素的“物质获得”方面,调查对象中月收入在2000-2900元和3000-3900元的受雇农民工数量最多,占到约2/3的比例。进一步分析月收入的均值为3230元,这与2013年北京市人保局公布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793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而调查结果中月收入在5800元及以上,也就是超过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仅为4.1%。从表3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可以看出受雇农民工在实际收入与期望收入间存在差距,多数农民工的期望收入都要高于实际收入1000-2000元。此外,对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居住是影响其劳动工作的重要因素,而结果中雇主给农民工提供住房的比例非常小,只有13.0%,绝大多数农民工还得靠自己找住处。在有无加班报酬方面,也有38.6%的受雇农民工没有加班报酬,表现了劳动获得的缺失。

在劳动获得因素的“精神获得”方面,受雇农民工在工作中感受到周围人的尊重比例(76.2%)要大大高于在北京感受到受尊重的人数比例(39.5%),这可以解释为受雇农民工在工作中周围人较为“同质”,因而较易受到尊重,而其群体放在整个北京社会,则会被视为“有差异”的群体,不易受到社会的尊重。

(3)受雇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并不完善。在劳动合同的签订方面,尽管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占多数,但仍有近1/3比例的人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这表明了劳动保障的缺失仍是当前农民工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难以维护,在拖欠工资经历方面,有过拖欠工资经历的农民工比例占到25.8%,也就是仍有1/4比例的农民工在正常获得劳动报酬的保障方面存在问题。

(4)受雇农民工的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在劳动工作时间方面,调查对象中57.9%的受雇农民工每日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上,而每日平均工作时长的均值也达到了9.5小时。此外,70.1%的受雇农民工每月工作天数超过22天,而每月平均工作天数的均值达到了26天。这样的劳动时间强

度已明显超过了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每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要求。在北京打工的受雇农民工群体,不仅从事的主要是中低端行业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也较长,表现出相对较大的劳动强度。

表 2 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操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频数	频率(%)	变量名	频数	频率(%)
基本属性			劳动获得因素		
			月收入		
性别			1900 元及以下	64	6.8
1 = 男性	558	58.6	2000 - 2900 元	323	34.5
0 = 女性	395	41.4	3000 - 3900 元	358	38.3
年龄层			4000 - 4900 元	99	10.6
1 = 90 后	217	22.7	5000 - 5700 元	53	5.7
2 = 80 后	419	43.8	5800 元及以上	38	4.1
3 = 70 后	203	21.2	工作中受尊重		
4 = 60 后(及之前)	117	12.3	1 = 是	726	76.2
受教育程度			0 = 否	227	23.8
1 = 初中及以下	472	49.8	在北京受尊重		
2 = 高中/中专	368	38.8	1 = 是	376	39.5
3 = 大专及以上	108	11.4	0 = 否	576	60.5
			雇主提供住所		
			1 = 有	124	13.0
			0 = 无	830	87.0
			有无加班报酬		
			1 = 有	537	61.4
			0 = 无	338	38.6
劳动保障因素			劳动强度因素		
签订劳动合同			每日工作时长		
1 = 有	622	69.5	1 = 8 小时及以下	399	42.1
0 = 无	273	30.5	0 = 8 小时以上	548	57.9
拖欠工资经历			每月工作天数		
1 = 有	229	25.8	1 = 22 天及以下	282	29.9
0 = 无	657	74.2	0 = 22 天以上	662	70.1

(三)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在数据的回归分析上一共设计了 4 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如表 4 所示。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3 分析了受雇农民工的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对其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公平感的影响,模型 2 和模型 4 则是在基本属性因素的基础上,加上代表劳动关系状况的劳动获得因素、劳动保障因素以及劳动强度因素进行分析。从模型 1 到模型 2、模型 3 到模型 4 的拟 R² 值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加入劳动关系因素后,模型 2 和模型 4 的解释度均达到了 30% 左右,表明选取的劳动关系因素对受雇农民工公平感影响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

表3 受雇农民工的实际月收入分类统计与期望月收入分类统计的交互结果

		期望收入分组						合计
		1900元 及以下	2000 - 2900元	3000 - 3900元	4000 - 4900元	5000 - 5900元	6000元 及以上	
实际 收入 分组	1900元及以下	6	24	19	2	8	5	64
	2000 - 2900元	2	18	125	84	68	21	318
	3000 - 3900元	1	0	23	100	145	79	348
	4000 - 4900元	1	0	0	22	23	50	96
	5000 - 5900元	2	0	0	0	15	34	51
	6000元及以上	0	0	1	0	1	33	35
合计		12	42	168	208	260	222	912

注:表中虚对角线表示实际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区间一致,对角线右上方数字表示期望收入区间高于实际收入区间,对角线左下表示期望收入区间低于实际收入区间。

表4 受雇农民工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

自变量	个体层面公平感				社会层面公平感			
	模型1 基本属性		模型2 劳动关系因素		模型3 基本属性		模型4 劳动关系因素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性别(男=1)	.360 (.181)*	1.434	.411 (.222)	1.508	.001 (.155)	1.001	-.099 (.197)	.906
年龄	-.003 (.010)	.997	-.014 (.012)	.986	.017 (.008)*	1.017	.017 (.010)*	1.018
受教育年限	-.017 (.033)	.983	-.043 (.040)	.958	-.025 (.029)	.975	-.011 (.037)	.989
月收入(对数)			.512 (.258)*	1.668			.190 (.242)	1.209
工作中受尊重(是=1)			.931 (.386)*	2.537			-.468 (.278)	.627
在北京受尊重(是=1)			1.334 (.231)****	3.796			2.320 (.227)****	10.172
雇主提供住所(有=1)			1.201 (.258)****	3.323			1.244 (.277)****	3.468
加班报酬获得(有=1)			.599 (.270)*	1.821			-.037 (.228)	.964
签订劳动合同(有=1)			-.413 (.260)	.662			.716 (.239)***	2.046
拖欠工资经历(有=1)			-.116 (.326)	.891			-.491 (.264)*	1.635
每天工作时长			.429 (.219)*	1.536			.860 (.200)****	2.362
每月工作天数			.374 (.234)*	1.454			.055 (.220)	1.056

续表 4

自变量	个体层面公平感				社会层面公平感			
	模型 1 基本属性		模型 2 劳动关系因素		模型 3 基本属性		模型 4 劳动关系因素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常数	-1.459 (.517)***	.232	-7.152 (2.198)***	.001	-1.328 (.453)***	.265	-4.983 (2.029)*	.007
Chi-square	4.329		154.186****		6.442		230.754****	
拟 R ²	.008		.286		.010		.364	
N	911		802		910		80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5, ****p < 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进一步从表 4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基本属性影响方面(模型 1 和模型 3),只有性别变量对个体层面的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即受雇的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更易对自身的经济地位感到公平。而年龄变量对社会层面的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即年龄越大,越容易对当前社会感到公平。在本次调查数据 80 后、90 后受雇农民工占多数的情况下,可以推测新生代农民工较易产生社会不公平感。而无论是个体层面的公平感,还是社会层面的公平感,教育变量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与李春玲(2006)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在劳动获得因素影响方面,从模型 2 和模型 4 可以看出,无论是“物质获得”的收入、提供住所、加班报酬因素,还是“精神获得”的受尊重因素,都对个体层面的公平感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可以说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和加班报酬获得因素对社会层面的公平感产生没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受雇农民工收入越高,加班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就越容易产生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公平感,而这些劳动获得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对社会的公平感受。

从前面的自变量描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的受雇农民工月收入在北京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上的是极少比例,且多数人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下,由此可以推测,受雇农民工由于收入较低而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不公平感会较强。此外,虽然雇主为受雇农民工提供住房的比例并不高,但提供住所有助于农民工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公平感形成。在“精神获得”因素方面,受雇农民工在工作中受到周围人尊重,更易产生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公平感,而在北京受到尊重,则有助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公平感形成。

在劳动保障因素影响方面,从模型 2 和模型 4 可以看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有拖欠工资经历对受雇农民工的社会层面的公平感产生具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设,但是这些因素对个体层面的公平感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容易形成社会公平感受,这符合经验探讨,因为劳动合同的签订能够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因而对他们的社会态度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有拖欠工资经历则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呈现负相关,即有过如此经历的农民工不容易形成对社会的公平感受,他们的挫折经历会显著影响其社会态度。

在劳动强度因素影响方面,从模型 2 和模型 4 可以看出,每天工作时长和每月工作天数对受雇农民工的公平感产生都具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设。具体而言,每天工作在 8 小时及以下、每月工作天数在 22 天及以下的农民工更容易形成个体层面的公平感,每天工作在 8 小时及以下的受雇者还易形成社会层面的公平感。这可以解释为,由于这样的劳动强度与诸多城市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间较为一致,且具有一定的劳动休息时间,因此对于受雇农民工而言,能够感受到在城市中与他人的劳动状态相似,相比较容易产生公平感。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民工大规模调查数据,探讨了受雇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关系状况——劳动获得、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强度因素对其公平感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需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当前在北京城市打工的受雇农民工群体中,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持有公平感的比例并不高。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不容易形成社会公平感。结合李培林等学者(2007、2010、201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发生变化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新生代受雇农民工的生活压力及权利意识对其公平感产生具有较强的影响,而这或许来源于他们的劳动关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如今已成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经历已使其生存理性和价值观不同于老一代(Solinger, 1999; 何瑞鑫、傅慧芳, 2006; 许叶萍、石秀印, 2010)。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难以再回到农村。他们将是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主体,因此,对于他们的社会心态需要尤为关注。

第二,受雇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较大与劳动获得较低不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受雇农民工劳动强度较大及劳动获得相对较低的现实,而且与他们的期望存在一定差距。这样的期望差距使他们对“获得/付出”比例的接受程度不高,一旦感觉付出多而获得少,则不会将结果归因于个人,随着生活压力增大及个人权利意识增强,必将产生不公平感的社会心态。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精神层面的劳动获得同样重要,消除社会歧视,让农民工感受到受到尊重,有利于公平感的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第三,劳动合同等保障有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获得,既体现了城市用工就业制度的规范,也能够将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者纳入到规范的城市就业体系中来,从而使他们感受到城市就业对其的公正接纳,有利于积极的社会态度形成。劳动合同需要有法制保障,一旦缺失,则会对现实的劳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李强指出的,超长劳动时间、拖欠工资等劳动权益无法保障现状会造成城市农民工的“被剥夺”问题,容易引发关系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李强, 2012)。

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劳动获得、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强度等劳动关系状况因素分析了对当前在北京的受雇农民工公平感的影响,并验证了提出的研究假设。不难理解,基于公正伦理维度的劳动关系调整,依然是解决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方式(赵健杰, 2007),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的改善,或许将成为提升他们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突破口。不过,本文在实证之余仍有不足之处,由于受到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所限,在设定分析因素时并不能充分考虑更多影响因素,如工会集体协商等的集体权利因素、社会保险等的劳动保障因素、劳动具体内容与劳动环境等的劳动强度因素等等,这也使得本研究仍有可继续深挖的空间,是今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去努力完善的内容。

参考文献:

-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 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陈海英, 2011,《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态度研究》,《安徽农业科学》第 33 期。
- 郭庆松, 2002,《当代劳动关系理论及其最新发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 2 期。
- 何瑞鑫、傅慧芳, 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中国青年研究》第 4 期。
- 胡荣、陈斯诗, 2010,《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赖伟军、吴志明, 2011,《底层中国的主体性建构:一个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李春玲, 2006,《各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分析》,《湖南社会科学》第 1 期。
- 李慧中、陈琴玲, 2012,《经济转型、职业分层与中国农民工社会态度》,《学海》第 4 期。
- 李珂, 2006,《论劳动关系状况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 6 期。
- 李培林、李炜, 2007,《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2010,《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李培林、田丰,2011,《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第3期。
- 李强,2012,《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忠勇、尉建文,2009,《挫折经历、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以10家企业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为例》,《社会》第2期。
- 王长仁等,2011,《边缘化生存: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来自珠三角某工厂的一项田野调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1期。
- 王甫勤,2013,《公平感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26日第A08版。
- 汪建华、孟泉,2013,《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开放时代》第1期。
- 王俊秀,2014,《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俊秀、杨宜音,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许叶萍、石秀印,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追求及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第3期。
- 游正林,2005,《不平则鸣:关于劳资冲突分析的文献综述》,《学海》第4期。
- 张翼、尉建文,2014,《特大城市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4期。
- 赵健杰,2007,《公平与正义: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伦理纬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1期。
- 赵琼,2005,《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光明日报》5月10日第B4版。
- 郑功成,2009,《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
- 郑英隆、黄振荣,2013,《工业化变革中的农民工劳动形态》(第2版),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 朱考金,2003,《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第6期。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larke, S. & Chang-Hee Lee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9 (2).
- Coser, Lewis A.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London: Free Press.
-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Prooijen, J. W. et al. 2006, "How do People React to Negative Procedures?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hority's Biased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5).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石金群

(positive emotion/neutral emotion/negative emo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we have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some kind of competence in lie detection, the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lie detection is higher than truth detection; lie fragments including emotional cues are more easy to be detected, especially in positive emotional cue, the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detection is the highest; for males,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etence in recognition of micro-expression and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lie deception; MET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s' competence in recognition of micro-expression, this improvement could facilitate males' judgment in lie detection more than females.

Keywords: Micro-expression Lie Detection Positive Emotional Cue Negative Emotional Cue Neutral Emotional Cue

Reconstructing the Contract between State and Young Families: Collective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Ma Chunhua*(66)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ldren have become (quasi)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investment goods from traditional private goods; meanwhile,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children have changed from owning exclusively by their families to sharing by whole society. But while the benefits from children are socialized, the cost of child rearing is still private. This kind of dislocation has brought about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cluding low fertility; this situation has forced every country to gradually form the consensus in state's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ren rearing, and implement this consensus in concrete social policy.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China takes fewer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besides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decrease its negative impact on young women's employment, reduce the burden of young parents and maintain substanti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na should reconstruct the contract between state and young parents and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by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Cost of Child Rearing (Quasi)Public Goods Social Investment Goods

Who have been 'Left'? *Liu Shuang & Cai Shenghan*(76)

Abstract: Using census data,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lthough the scale of 'unmarried elders' is large in our country, the percentage in age cohort is very low; there are more males than females within the group with more disparity in rural areas; the majority of 'unmarried elders' in rural areas are old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regarding marriage selection of 'unmarried elders', 'elder females' are difficult to find their spouses in urban areas, while there are more left 'elder males' in rural areas. Regarding the essence of 'unmarried elders' issue, it is not due to imbalance in ratio of age and sex in general population, but rather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means outstanding females and disadvantaged 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unmarried elders'. In recent years, with increase in scale of 'unmarried elders' and rise of its percentage in age cohort, gender imbalance in quantity has slowed down. For most 'unmarried elders', this is just an temporary living condition in their whole life course, most of them will enter marriage eventually. The males who never marry all their life are less than 4% , the females are less than 1% .

Keywords: Unmarried Elders Marriage Squeeze Urban-rural Difference

The Study on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and Sense of Justice *Li Sheng*(85)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towards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on their sense of justice. According to research, we ha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t's not easy for young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o form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relative low labor rewar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perfection of labor security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 relative large labor intens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we could infer that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might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promoting migrant workers'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Labor Relations Sense of Justice